



清华经济史论丛

经济史理论与实证

吴承明文集

吴承明 著
刘兰兮 整理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浙江大学出版社



清华经济史论丛

经济史理论与实证

吴承明文集

吴承明 著

刘兰兮 整理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浙江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经济史理论与实证：吴承明文集 / 吴承明著；刘兰兮整理. — 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2.6
ISBN 978-7-308-10061-8

I. ①经… II. ①吴…②刘… III. ①中国经济史—文集 IV. ① F129-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120230 号

经济史理论与实证：吴承明文集

吴承明 著 刘兰兮 整理

责任编辑 赵 琼

装帧设计 王小阳

出版发行 浙江大学出版社

(杭州天目山路 148 号 邮政编码 310007)

(网址: <http://www.zjupress.com>)

制 作 北京百川东汇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印 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635mm×965mm 1/16

印 张 27.5

字 数 448 千

版 印 次 2012 年 8 月第 1 版 2012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308-10061-8

定 价 56.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浙江大学出版社发行部邮购电话 (0571) 88925591

总 序

清华大学经济史学科的重建始于 20 世纪末。在清华大学“振兴文科”的部署中，李伯重、陈争平、秦晖、高淑娟、龙登高、仲伟民等经济史学者相继被引进清华园，组成了一个特色鲜明的学术团队，并于 21 世纪之初，建立了清华大学中国经济史研究中心。晚近，耶鲁大学陈志武教授作为长江学者、国家“千人计划”优秀人才加盟清华，在清华建立“清华大学市场与社会研究中心”，推动经济史、金融史、社会史等基础理论的跨学科研究。在龙登高教授的主持下，经济史学科与人文社科学院、经济管理学院和公共管理学院合作创建“清华大学华商研究中心”，书写古今货殖列传。因此到了今日，清华大学的经济史学科已颇具规模，成为我国经济史研究的重镇之一。

清华经济史学科注重国际视野，立足学术前沿，在浙江大学出版社的积极支持下，主编有“社会经济史译丛”，将一批国际经济史学家的力作及时译成中文出版，反响良好。学科还与《中国社会科学报》合作开辟“海外学潭·经济史”专栏介绍国际名家、名篇。

清华经济史学科创建的多种经济史研究与交流平台，还包括“清华经济史论坛”，专门邀请国内外著名学者（特别是海外学人）来介绍其最新研究成果或国际学术动态；每年还主办或合作主办国际学术研讨会；举办“清华—北大经济史沙龙”，随后南开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等加盟，四方联合展开学术交流与争鸣。

这些学术平台推进了清华经济史学科的学术研究与人才培养。为了集中体现学科成果，21 世纪之初出版了“清华大学中国经济史研

究丛书”，今简化为“清华经济史丛书”。除了继续推出清华经济史学者的力作之外，也将上述学术活动与平台的成果结集为丛书出版。为了重振清华经济史学科，发扬清华前贤的传统，丛书亦将清华园走出去的当代经济史大师的成果整理出版，这些成果包括 20 世纪国内经济史研究领军学人梁方仲、张荫麟、严中平、吴承明，在海外学界发展的何柄棣、杨联陞等，以及在清华从事与经济史相关研究的大家如梁启超、张岱年等。此外，清华经济史培养出了一批又一批青年学者，这些后起之秀的出色成果，也将精选出版以展现学科的发展。

龙登高

2012 年 6 月于清华园

序 言

经济史学大师吴承明 1917 年生于河北滦县。1934 年入清华大学经济学系学习。以北平爱国学生领袖之一，参与“一二·九”运动。1936 年秋被迫离校，入北京大学历史系学习。抗日战争爆发后，至昆明西南联合大学复学。1940 年毕业。1943 年冬，入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经济系学习，1946 年获工商管理硕士学位。1947 年初，在上海任交通大学、东吴大学教授。新中国建立后，1958 年任中国科学院（后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并兼任中国经济史学会会长。2006 年 8 月，被授予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

吴承明学贯中西，融通古今，数十年如一日，在中国经济史领域辛苦耕耘，取得了杰出的学术成就，树立了经济理论与历史实际密切结合的典范。

近代中国经济发展的评估 吴承明精通计量经济学，重视运用计量方法作实证分析，并始终贯彻于经济史研究之中。由于近代中国缺乏健全的统计制度，数据资料很不完整。他用自己专研的理论和方法，对不确切的情况，作出比较妥切的判断。从 20 世纪 40 年代以来，先后发表了多篇关于帝国主义在华投资、中国近代资本集成、工农业和交通运输业产值、市场商品量等数量分析的专题论文，对中国近代经济的发展水平，作出了比较全面的评估，受到了学术界的重视。

市场理论与市场史 他具有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和西方经济学理论的深厚根底，深知市场在传统经济向现代经济转变中的重要作用，认为经济现代化过程，实际上是以市场需求为导向，商业革命

导致工业革命，而整个社会的现代化变迁也常在市场上反映出来。从20世纪70年代起，就着手市场问题的研究。他从交换和市场史的研究中，提出历史上各种市场的出现，多与分工无关；提出交换先于变革自然的“生产”，并经历了劳动交换、商品交换、智能交换等五种形式。他从构建交换与经济发展的模式中，更提出了交换通常是经济发展的导数的论点。在实证研究方面，他运用大量史料和计量方法，从商路、市镇和商品运销等方面，研究了明代国内市场、清代国内市场和近代商品流通的宏观模式。20世纪末，又进而将市场研究提升到从人口、价格、货币量、商品量等的变化入手，以分析市场的周期性变化，并讨论其对社会结构和阶级分化的影响。

中国的现代化 对中国的现代化、工业化，他提出事物内部具有能动因素，甚至对立物之间也具有互补功能的论点。他通过对中国二元经济的实证考察，指出传统农业不仅可以为现代化产业提供廉价劳动力，并且还可以提供剩余。充分利用手工业和传统的手工业与农民经济结合的功效，可能走出一条立足本土、工农结合、土洋结合进而现代化的道路。他以经济为主，以社会思想为参照，从物质层次进而到制度层次，乃至思想层次，论述了16—17世纪出现的现代化因素，并且指出，经济发展是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等各层面因素互动的结果，不仅要考察物质发展的量，还要考察制度变革的质，两者具体化为社会变迁。在中国，在这种考察中，要特别注意国家的正面和负面作用。而经济发展、制度变革、社会变迁，在最深层次上都要受意识形态的制衡，即儒家思想的制衡。

历史观与方法论 从20世纪末起，他又致力于经济史学科的理论与方法论的研究，以探求学术思想的升华。他坚持发展的历史观，认为人类社会经济的发展，可能有曲折，也会有回潮，但总的趋势是进步的。他提出中国的封建主义，由于吸收和容纳了异质的商品经济，并将它转化为自己内在的能动因素，在16世纪以后就发展为一种能够与资本主义长期共存的近代封建主义。他反对用理论模式推演历史。各个时代的经济发展总会形成某种模式，但这是研究的结果，而不是研究的出发点。历史认识具有相对性，研究历史就是研究过去我们还不认识或不清楚的事情，随着知识的增长和时代思潮的进步，

又会变得不清楚了，需要再认识。历史就是无休止的再认识。他重视实证主义，认为这是研究经济史不可须臾背离的基本方法。历史应当有价值评判，实证主义不能作价值评判是其局限。经济史的价值评判，应采用实证分析和规范分析两种方法，前者将研究对象置于其产生或运作的具体历史条件下考量，即采用历史主义的原则。后者应用今天的价值观来分析历史事件或行为对当时的作用，以及对后代乃至今人的影响或潜在效应。他主张“史无定法”，应当根据研究对象和具体问题选择适用的方法，无论是传统史学方法，还是国外新兴的各种学派的方法，均可采用。他强调应当历史地看待经济学的发展，任何经济理论都有其特定的历史环境。在经济史研究中，一切经济学理论都应视为方法论。任何伟大的经济学说，在历史的长河中，都只是经济分析的一种方法，而不是推导历史的模式。

特别值得提出的是，从20世纪50年代起，他曾经对中国资本主义经济进行过长期深入的研究。从收集整理历史资料着手，涉及的资料达数千万字。主持编辑了《中国资本主义工商业史料丛刊》八种。接着他和著名经济学家许涤新共同主编了《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三卷本巨著，不幸许涤新于1988年逝世，因之该书从规划设计、重点章节撰写到修改定稿，均由他主持，于1992年完成。从收集资料算起，寝馈于中者凡三十年。该书分析了不同时期外国资本、官营资本和民营资本的消涨、产业结构的变化和发展水平，反映了半殖民地半封建条件下，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崎岖道路。这部著作是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受到了国内外的广泛推崇。

他的著作，必将传遗后世，嘉惠士林。

方行

2011年11月30日

目 录

近代中国经济发展的评估

我国资本构成之初步估计（1931—1936） 3

中国工业资本的估计（1936—1946） 34

近代中国经济现代化水平的估计 61

近代中国国内市场商品量的估计 75

市场理论与市场史

市场理论与市场史 89

试论交换经济史 100

16 世纪与 17 世纪的中国市场 117

18 世纪与 19 世纪上叶的中国市场 147

中国的现代化

中国近代经济史若干问题的思考 195

论工场手工业 208

论二元经济 231

近代中国工业化的道路 248

传统经济·市场经济·现代化 256

现代化与中国 16、17 世纪的现代化因素 265

经济发展、制度变迁和社会与文化思想变迁的关系 289

历史观与方法论

经济史：历史观与方法论 295

论历史主义 329

经济学理论与经济史研究 344

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 356

附录

关于传统经济的若干论述——与方行先生的通信 367

学贯中西古今 德泽桃李同仁——吴承明先生的生平与学术 401

作者论著一览表 423

近代中国经济发展的评估

我国资本构成之初步估计（1931—1936）

一 我国资本构成之初步估计

关于我国资本构成（capital formation）之研究，作者尚未见有系统之著述。兹先将零星之记载略加叙述，再述作者之初步估计。J. L. Buck 教授在其所著 *Chinese Farm Economy* 中，调查 1921 年至 1925 年 2 866 个农家之平均每年资本增加为 7.62 元，而每农家之平均每年收入为 376.24 元。^① 依此则农业方面之资本构成为农业总收入 2%。根据刘大中估计 1931 年至 1936 年全国农业总所得（Gross income）平均每年为 179 亿元^②，以此数乘以 2%，则农业方面之资本构成为每年 3.6 亿元。又根据巫宝三估计 1931 年至 1936 年平均数每年农业之净产值（Net value product）为 131.4 亿元^③，加巫氏所估计之农业折旧 9.5 亿元^④得总所得 141 亿元。乘以 2%，则农业方面之资本总构成为每年 2.8 亿元。又 Buck 之《资本增加》项内，包括土地之投资，而土地投资占农业投资 77.7%。设新投资之增加亦依此比例（实际不能如此），则农业方面之资本总构成仅有 8 000 万元（依刘氏估

① J. L. Buck, *Chinese Farm Economy*, 1930, Chicago, p. 65.

② 刘大中之著作，将由 Brookings Institute 在美出版，此为根据其 1940 年修订油印稿，*Gross National Product of China, 1931—1936*, May 1956, p. 112.

③ 巫宝三等之著作在付印中。此为根据其复写原稿《中国国民所得》上册第二章第四表之数字相加而得。

④ 见后文资本折旧之估计中。巫氏估计 28 种作物农舍折旧 345 百万元，农具折旧 494 百万元，其他农业折旧共 112 百万元，合计 951 百万元。

计)或6 000万元(依巫氏估计)。农业生产约占我国总生产值70%，以此推算非农业方面之资本构成最多亦不会超过总产值5%。一般年鉴常推测我国之投资有国民所得10%，恐属过高。

谷春帆曾根据进口之资本品(capital goods)推测我国工业资本之积累。因中国自产之机器工具等甚少，故此项进口之走势可代表中国工业资本之发展。此类物品大皆耐久，故可将其价值逐年累积，以代表工业投资总额。其法系先将1912年至1938年进口之农工机器工具及铁轨之价值换算成英镑值，以减消此27年中国币值变动之影响。然后将此英镑值逐年累积，而求其直线走势。依谷氏计算，累积价值自1912年之642 911镑增为1938年之130 611 654镑，27年中增加203倍，每年平均增长5 518 698镑，其公式为 $y = 690\,015\,471 - 55\,189\,693x$ 。^①此项增值，包括中国境内外商企业之新投资。谷氏估计外商投资约占全国工业资本3/4，故国人之新投资为此数1/4，即约1 379 674镑。以全国4.5亿人计，每人仅合0.003镑，或国币6分。按谷氏外人资本为全体3/4之估计，实属过高(见下文)。以中外合计每年增加550万镑计，约合国币8 800万元，尚不及全国总产值1%。谷氏之计算，可表示过去我国新式工业资本增长之趋势，但不足以表示资本构成之数值。

巫宝三等在其所著《中国国民所得(1933)》中曾企图对投资额加以估计。其法系用选样法估计全国之总消费额，再自其估计之所能支配所得中减除消费额，即为投资额。其所估计之国民所得及消费额均为1933年数字，再用各种生产及物价指数推求1931年至1936年之国民所得，又用北平生活费指数推求1931年至1936年之消费额。所得结果如下^②：

① 谷春帆之文，曾发表于《经济动员》某期。唯作者未得该刊，此所根据为其修改后之英译文，载于 *Problems of Economic Reconstruction in China, Part II., Capital Stock in China*, 1942，该书为第八次太平洋学会之论文。

② 巫宝三《中国国民所得》原稿，上册，第一部第二章。

(单位：百万元)

年份	所能支配所得	消费	投资
1931	23 225	24 173	-948
1932	23 610	23 014	+596
1933	20 058	20 441	-383
1934	18 410	20 060	-1 650
1935	21 310	21 675	-365
1936	26 928	25 282	+1 646

巫氏的假定是：生活标准不变，消费不因所得之增减而增减；这在理论上自有问题，但在数字上的变动不会很大。六年间所得的变动，以不变币值计算，亦并不大。唯其所用方法，颇可考虑。其所估计之“所能支配所得”，正确性本不甚高，所估计之消费额，则因选择过少及年份改算等，可靠性更低。且后者为一大数，若后者有10%之误差，则相减之结果，可能误差100%，甚至变正数为负数。再则其“所能支配所得”中，包括外国投资而不包括商品净出口，亦欠妥当。其1933年之消费额与所得额，为用两种独立之材料估计者，结果与理想情形相差并不大。但此仅可谓一种巧合，不能证明两者估计正确。如吾人以其消费估计用于刘大中之所得估计，则1933年之投资将变为正的4亿元。又巫氏之消费估计，Simon Kuznets曾为文评论，并用商品流动法（commodity flow approach）另作一部分之估计，与巫氏数字，相差甚大。^①

此外 Eugene Staley 在其新著 *World Economic Development* 中曾引用 Robert W. Tufts 之研究，推论中国战后之投资可能。此虽非对中国资本构成之估计，但其推论结果，不妨略述。因吾人研究资本构成之目的，本在推论战后工业建设投资之可能性也。Tufts 根据日本公司实缴资本及中央与地方之实业公债计算日本1900—1936年间之投资总额及每10年之平均额。又以为中国与日本，就人民之生活习

^① Kuznets 之评论现存资源委员会经济研究室，题名 *Comments on Mr. Ou's Estimate on National Income*, Appendix III, 1946.

性和劳动情形而言，大致相仿。因假定中国战后 40 年之经济发展，一如日本 1900—1936 年之情形。其方法系将日本投资分为甲、乙两型，甲型为投资于工商业及地方公用事业者，假定与人口总数发生关系。乙型为投资于农业及交通者，假定与土地面积发生关系。因而以 1900 年日本之人口与土地与中国战后情形比较，推测中国战后 40 年可能吸收之投资如下表^①：

(单位：百万美元，1936 年币值)

	第一个 10 年	第二个 10 年	第三个 10 年	第四个 10 年
甲型	5 040	13 680	25 065	28 035
乙型	8 549	9 437	19 874	23 538
总计	13 589	23 117	44 939	51 573

Tufts 之推算，在原则上及方法上可议论之处极多，以非本文范围，不加赘述。其所得之“可能吸收资本”数，与下文所估计之过去情形相较，高出数倍。但与我国现在高唱之“百万万美元建设计划”，尚相差不如。

二 1933 年资本总构成之初步估计

(一) 本文所用之方法

本文所用之估计方法甚为简单，即将一年内所有资本品 (capital goods) 之总产值 (包括进口净数) 与该年之建筑总值相加，再以该年之国际债务净变动修正，即得该年之资本总构成 (Gross capital formation)。以此数减除该年之资本折旧 (capital depreciation) 即得该年之资本净构成 (Net capital formation)。此间吾人所略去之项目为商品盘存之增减，它一般依商业循环而变动，在商业活动变化不大之数年间，其增减有限。本文所估计之 1931 年至 1936 年间，除物价

^① Eugene Staley, *World Economic Development*, Montreal 1945, p. 94.

变动外，生产之变动有限。全国总生产以不变物价计算，高不过 413 亿元，低不过 389 亿元（刘大中数字）。故可将此项盘存变动略而不计。同时吾人研究资本构成之目的，在推论战后工业建设计划中之资本问题。一般工业计划例无为增加盘存而设之资本项目，故此项省略亦属合理。

资本品之总产值（Cross value produced），分别按下列项目估计：（1）华人工厂所生产者；（2）在华外商工厂所生产者；（3）东北中外工厂所生产者；（4）手工业所生产者；（5）进口者；（6）东北进口者。所以如此分类，完全为迁就资料之方便。其中（1）（2）（3）之和为全体工厂产品。其总价值为出厂价，即按生产者价格（producer's price）计算者。欲以之计算资本构成，须改按使用者之价格（price at cost of final users）计算，即须将原价加上运输及分配费用与机器装置费用。此项费用，无资料可据。依美国统计，此项费用约合使用者价值 25%，或合生产者价值 30%。我国交通运输落后，工人技术不高，此项费用可能很大。但重要工厂多集中在上海等大港口，且人工便宜，故分配费用亦不会太高。兹假定为生产者价值 40%，恐不算低。至于手工业产品，大皆为当地销售，买主自行携回，故不计运输分配等费用。进口之资本品，包装完整，且多销于沿海大埠，故此项费用可能稍低。但连关税洋行利润等合计，恐亦不少，因亦按 40% 计算。

本文之各项估计，亦以 1933 年为准，然后再推求 1931 年到 1936 年之数字。因除 1933 年外，甚少可供引用之资料也。兹先将 1933 年之估计结果列为表 1，然后分项解说数据来源，各项估计材料大部分取自巫宝三等所著《中国国民所得》中之计算，而加修正者。巫氏本有单行估计投资与消费之意，吾人此间虽未能完全用独立性之材料，然亦可做巫氏数字之参考。

再则本文所用之方法及若干取材，均为 Simon Kuznets 教授于 1946 年 8 月来华时所提出。作者当时帮助 Kuznets 工作。Kuznets 为研究国民所得及资本构成专家，无须介绍。研究此问题者，可以其所著 *National Income and Capital Formation 1919—1935* 及 *Commodity Flow and Capital Formation 1939*，为主要参考。